

弱者的胜利

——人类学田野视角中的上海普通股民

钱斯蕴

摘要:

股民是中国股票市场上一个巨大的投资群体,他们与整个中国资本市场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相对股市中的其他投资主体,股民在中国股市二十年的成长中一直处于艰难的弱势地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这种强弱对比尤为凸显。但他们在与国家、市场、经济、社会的互动中,在顺应和坚持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意义。因而股民之存在本身,而非其业绩盈亏,就成为了能动的弱者的一种胜利,也将为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石。本文借助人人类学田野视角,采取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研究手段,观察和记录上海证券交易所普通股民的生存状态,关注和探索他们在特定空间创造出的生活意义,从股民自己的声音中解读个人面对社会结构性力量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Abstract:

Gumin (a local term which refers to stock investors holding a small or insignificant amount of shares) is a vast group of investors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They have a close and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 and the economy. Compare to other investors in the stock market, they have been staying in a weak position during the 20 years of the stock market history. This obvious vulnerability of weakness has become intensified with the adven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However, through developing routine strategies that allowed themselves to interact with the country, the market, the economy and the whole society, Gumin were able to find meanings of life in the local social world in which they conformed to norms while persevering personal dignity. Based on ethnographic evidence, I argue it was their existence, rather than their concern with profits and losses, which gave them meaning for a fruitful life. This has strong indication of the triumph of the weak, which could lend itself to more optimistic future outlook of the Chinese capital market. With a strong focus on Gumin's everyday life and meanings created within the scattered social spaces of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SSE), my thesis aims to bring multiple voices to bear on the issue of how much individual will, or agency, affects the way Gumin behave and think, in the face of structural forces that are beyond their control.

关键词: 股民, 证交所, “弱者”生存的意义

Key Words: Gumin, stock exchange, the meaning of being “weak”

一、引子

前边是路

他们很敏感
是网上的蜘蛛

他们很茫然
是网中的猎物

——顾城

顾城原本写的是大街上的小贩，然而城市里敏感而茫然的人又何止他们。在 09 年年初我第一次踏进离家不远的一所证券交易所的时候，眼前的一大群人就自然而然地在我脑中与这首诗相互映照。我正拿着新年的压岁钱准备开户购买一个基金作为自己金融投资的初试，因不知道选择哪个基金而不停向人咨询。彼时，大厅里吵闹得听不清的说话声很让我感到烦躁厌恶，我想起生活中很多眼前盯着 K 线，耳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股评，嘴边不离“股经”的人，想起我对他们“言语乏味，面目可憎”的印象。但我却很快意识到，站在这个地方的这段时间，我恰恰就和他们一样，既渴望把握难得的市场反弹时机获得利润，又在为不确定股价将怎样运行犹豫担忧。

他们就是上海股民。自 1986 年 9 月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这一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并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他们被还原为个体，却比社会最底层的小贩更常常以“弱势群体”自居。局外人不会明白，一个既有空闲又有资金去炒股的人究竟无助可怜在哪里，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有产阶级”。

但这片刻的同甘共苦仿佛让我有所感悟，也让我致不致再轻蔑他们的生活。股民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仅仅顾名思义，将之定义为股份制度条件下的所有股东，或是股票市场的所有参与者的话，那么我们对“股民”概念，就犯下了扩大其外延的错误，股民也自然谈不上弱者。这里所说的“股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他们是在资金量、持股量和对上市公司了解度各方面都远远少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基金以及在华外国投行等机构的市场中小投资者——俗称“散户”。

分散的股民，和所有的弱者一样，都不会甘于弱势。如果说马来西亚的农民都会握起“弱者武器”（参见 Scott, 1985），与乡村中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作出持续不断的斗争，那股民这群“非典型”的弱者是否也会在行动中体现出类似的韧性？更重要的是，除了在权力制定者本身所框架的范围内游走——譬如农民的偷懒、开小差和暗中破坏，弱势的股民能否越过这些边界，获得农民所无法取得的更加光明彻底的胜利，一种超出其他弱者“自我保存”的行动意义？

因此，本文希望能从上海股民的声音中了解作为弱者的他们在金融市场中的生存地位和状态，以及探究他们除了自我保存之外，在炒股过程中创造出的生活意义。本文也相信，对他们过去和当下的生活描述可以被视作二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经济成长和发展的一份历史和田野记录，为我们保留和铭记。

二、研究背景

远在 1602 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股票制度。从此，以股票形式集资入股的方式得到发展，并产生了买卖交易转让股票的需求。1613 年，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的创建与发展晚于西方，在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是 1905 年外商组织的上海众业公所，以及 1918 年设立的北平证券交易所。建国后，因为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原因，完全取消了证券交易。1990 年 12 月 1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揭牌仪式的举行，标志着上海证券集中性有形交易市场运作的开始。也只有在此时，才可以说上海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市场（龚浩成，2001：1）。

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不遗余力地探索上海金融市场的奥秘、分析投资者行为的同时，社会学和人类学也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思路，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和行为产生了兴趣。确实，任何经济行为都不是独立于社会、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因而在日常实践中并不能完全自由地遵循自身的所谓纯经济的理性逻辑。也就是说，用纯经济的术语分析经济行为和制度，往往会忽视对事情在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有影响的非经济原因（哈维兰，2006：194）。这些“非经济原因”包括：社会历史和文化、现实生存环境、投资者的个体特性等等。

此外，专业人类学者的整体论全观视角（holistic perspective），使其在考察特定语境中的一些貌似完全为飘忽不定的市场所左右的行为之时，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比如说，人类学者在观察描述某一特定群体时，通常都会论及其居住区域和生态环境、家庭组织、当代语言的普遍性特征、定居模式、政治和经济制度、宗教信仰、服饰和艺术风格。人类学者认为如将这些当地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视作一个个孤立的分析单位，那么田野研究将失去正确的导向，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偏差和谬误。

整体论视角要求人类学者既有全局观，也不放弃对细微末节的重视。也就是说，只有在组成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不同要素之间寻找互为关联的结点，研究者才有可能对文化有详尽和全面的了解。难怪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和股民心态和行为的首次系统和深入的实地调研和分析，是出自一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文化人类学博士艾伦·赫兹（Ellen Hertz）之手。1992 年，赫兹在当年的一阵“股票热”中来到上海的证交所，进行了十个月的田野研究（参见 Hertz, 1998）。她的访谈对象包括与上海股市相关的主要政府机构（央行上海分行、税务局、体改委等）官员、证交所经理和一些经济学家，这让她的民族志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视野。在描述“股民”（大户与散户）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她发现国家不能控制市场，即不能控制市场上的股民，国家与股民的关系不再是统治关系，个人或集体不需要通过运动、反抗等方式来对抗国家，就能获得比国家更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她称这种关系是散户的“胜利”。

虽然在现有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已经有赫兹对上海股市交易行为所作的极具开拓性的民族志研究文本，但本论文决非毫无价值的重复劳作。首先，相较于赫兹显著的外来者的身份（即 *etic* 客位身份）和语言障碍，笔者借助“土生土长”的优势（即 *emic* 主位身份），能更深入到普通“股民”的日常生活中去，从而更近地观察到他们的能动性与其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制度的联系和互动。在这一意义上，恰好可以与赫兹所着重分析的股市中的国家扮演的角色形成对照和互补。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笔者进行的田野研究与赫兹当年初探上海股市相距有 18 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国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加入世贸组织并且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之后，中国的金融工商业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之间，可以说是到了息息相关的地步。也就是说，进入 21 世纪之

后，上海股市与纽约华尔街等世界顶级证交所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可能是赫兹在1992年时在上海“万国债券”门口时进行实地观察时所能预见或想象的。

笔者与赫兹在截然不同的历史瞬间所进行的人类学考察，势必会有不同的研究预设、在不同田野环境中采取的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策略以及不同的研究发现。我们知道，赫兹研究的1992年上海金融市场正值其最热闹甚至疯狂的生命时刻，每一家证交所里都挤满了经验浅薄但兴奋热情股民。国家则同样经验浅薄地面对着这个庞大、混乱、难以掌控权力主体。这种历史条件促成了上述的那种胜利。现在，我们却遇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历史时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征象随之显现。中国金融体系里面最具代表性的股市迅速地受到巨大的冲击，普通股民的切实利益遭到了严重的威胁。如果说他们早就自况“弱势”，那么这个前所未有的考验无疑会是雪上加霜。它对股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是否会在某种程度对赫兹笔下九十年代形成的市场权力关系做出颠覆？十几年的成长之后，股市与股民各自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都需要重新踏入上海股票交易市场才能解答。

在赫兹之后，中国研究者潘伟荣也深入证交所，观察分析了股民中的一群特殊群体：职业股民，即从普通股民中分化出的“股市精英”（参见潘伟荣，2005）。作者试图以此“理想型”反映一般股民群体的现状、他们与证券市场发展的关系以及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因此，作者的20个个案分析对象全都是股民里的佼佼者，他们成功地使自己的股票市值扶摇直上，各自实现了“发财梦”。而众所周知的是，股市的高风险性以及金融风暴的无可抵挡决定了这群“精英”的命运令人担忧，也决定了他们不能真实反映“一般”股民群体的现状。

事实上，“职业性”恐怕无法仅仅由“收益”来判定。在中国股市在经历了2008年一整年的跌势后，我们依然可以在沪深的证券市场里找到这样的一大群人：他们以敏锐时刻捕捉着遥远变幻的经济动向，又无法逃脱地深陷经济对他们密不透风的网罗。无论收益惨淡或是业绩卓越，他们对这场博弈游戏始终不离不弃，在他们决定退出之前，都完全配得上“职业股民”的头衔。本文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类股民。“职业股民”，让我们借用这个词，远非一个精英群体。他们在宏观经济的主宰力之下处在什么地位、怎样与社会经济互动，而非他们中成功者的秘诀，才是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长期以来，社会学都存在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沿着涂尔干、韦伯、帕森斯等早已强调过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互动在社会整合中的关键作用而展开的，另一条则是沿着与集体特性相差别个人能动性路线而展开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在处理这两条路线的时候试图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非重大历史事件来寻找它们的交汇处。在他看来，在我们日常司空见惯的活动中，人创造了社会，但他们也受着一定客体性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即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化通过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固定化”，创造性地促发日常生活的管理，使人的实践意识固定在特定的客体性场景之中（吉登斯，1998：7-8）。

笔者依此选定了上海的证券交易场所为田野研究的理想地点。目前，上海共有证交所营业部共452家，散布在城市的各个区域。对上海股民而言，这是他们最为集中、最为依赖的活动空间，并且，去证交所的股民往往能利用这个空间，比上班族或学生股民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炒股上。因而在这个特定的时空下发生的事情、创造的话语将更能说明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在《制造市场：华尔街上的乐观主义和困厄因素》¹一书中，公共政策学者阿波拉菲亚（Abolafia）对如何在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特殊田野场所，进行常规意义上的人类学考察做了颇有意味的探索和反思。他认为：在高度精英化的商业环境中进行田野研究，必须以包括证券和期货交易员、投资者个人以及作为政府和各类金融机构代表等在内的被访对象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参见 Abolafia, 1996）。而在证券交易所这种与村间田头和茶馆咖啡馆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要想与接近被访对象并与之建立信任关系（也就是说田野研究的必要前提），不管是来自异邦的赫兹，还是土生土长的笔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耐性来应对任何无法预知的困难和挑战。

笔者采用人类学参与观察及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在 09 年二月到四月对本市杨浦区控江路及营口路两家“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的股民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田野调查。

证券所里的股民大多是离开了工作单位之后投身股市的中老年人，我的访谈对象年龄皆在五十岁以上，包括退休干部，退休工人，与工作单位“买断”的工人，以及停止了生意的私营企业主共八人。

从开始由相熟的朋友领我去“搭讪”，到与他们熟悉起来只用了不久的时日，因为无论一天的行情令他们心情大好或是满腹牢骚，讨论和倾诉都是很自然的想法。我也无需与他们约定访谈时间，在交易时间里的任何时刻走进证交所，必能在各自固定的位置找到他们。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观察和访谈的难度。

我对股市知识的一无所知却是利弊兼有，他们既能毫不顾忌地展示自己撰写经验的小本本，把经苦心研究修改的指标和数据指给我看，又无法从我似懂非懂的眼神里得到太大的共鸣和崇拜，以至于我常常为了不能以此取悦他们感到懊恼。

四、证交所日常生活的结构

证交所尽其可能地为股民们提供了留在那里操作所需要的一切。股市的开市时间为上午九点三十分至下午三点。每天一早九点不到，证交所的大门就已大开，迎来陆陆续续到达的大中小户，他们常常早于职员地各就各位，到了九、十点，在人数上达到高峰。将近午休的时候，股民们渐渐散去，但直到十一点半停盘，人也绝不会散尽，他们的午饭问题完全可以在证交所解决——洗洗餐具，倒杯开水，用证交所里的微波炉加热早上就带来的饭菜。一点到三点又如同上午的情形一般，到收市之后，还有不少人意犹未尽地留在那里，继续研究或者讨论，直到四点多才会离开。

两处证交所营业部在建筑格局和环境上都非常相似：大门口分立两头铜牛，走进门，一楼为散户大厅，二楼为中大户室。只是营口路一楼的散户大厅更为宽敞，有一个超大电子屏幕上显示着密密麻麻红绿交错的股票及价格，每日映照着面前坐成一排排的股民的眼。另一边则摆放着几十台电脑，供他们查询和操作。二楼则都密布着数十间大大小小的机房，另有 VIP 室、会议室、经理副经理室、投资咨询室等，供投资金额及交易量大的股民使用。

靠近门口的白墙上都贴有醒目的“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的警示性标语。当然没有任何人会多看它一眼，因为走进门来的人若非只当它是一句废话，就早已对此深有体会。

散户大厅环境嘈杂而混乱，行情火爆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低潮时，讨

¹ 此书的英文书名为：*Making Markets: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论行情的人少了，多了织毛衣、看报纸、拉家常的人，多了一两张引人围观瞩目的牌桌，热闹依旧；楼上的房间里则通常少言语，开盘时往往只听得见关于股价的轻声讨论和电脑键盘的敲击声，空气里弥漫的紧张感时常让我这个外来者都感到如身处战场。这时候很容易看出人们不同的性格，有人沉郁冷静，片言不发，有人则情绪激动，涨跌时都忍不住拍案叫出声来。总之，这种上下楼各自特色鲜明的炒股气氛在不同的地方令人惊讶地别无二致。

有趣的是，如果当天的走势不是一跌到底的话，在中大户们最兴奋紧张、全神戒备、两眼放光的四个小时里，我既感新鲜又感困乏。虽与他们共同渡过一天生活最精彩的时分，但除了安静地坐在一边旁观他们各自的神色和无趣的屏幕，很难在那段时候找到愿意拨冗开口的对象。直到屏幕上的数字忽然静止，一天的交易最终结束，他们才迅速地回复常态。

五、市场风险与不确定性——股民的弱势

仅从这样的生活工作环境看来，股民们就难以和街头的小贩、工厂的女工、贫困的农民这些我们常识中所知的“弱势群体”相符。然而尽管股市里不乏那些光辉耀眼的成功故事——上至上市公司的老总、下至坐在证交所里角落里的某个专心致志的老伯，人人都有可能实现创造财富的神话——大多数股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输多赢少”才是一种常态。他们自称“弱势”，指的是自己在股票市场的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

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风险、矛盾和不确定性是现代性的特征（乌尔里希·贝克，2003）。这种风险尤其鲜明地表现在了股票市场中。“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告示虽常常因泛滥而受到忽视，却极为精准地概括了市场的性质。可以说现代社会那种“命运般”存在的风险使股民在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1、国家与机构

作为风险的“来源”被证交所里的股民提及的总是并非坐在他们身边那些零和博弈的对手，他们似乎更把对方视作散户大军中的战友，是其它市场参与者——国家与机构对股价巨大控制力下同病相怜的“受害者”。

早在 1992 年，赫兹就发现了股票市场遵循着“朝贡生产方式”（TMP，即 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参见 Hertz，1998）。这一启发赫兹的思路，来自于葛希芝（Hill Gates）的说法：朝贡生产即指中央政府在其直接统治的地区所运行的一种经济体系，其中，“施者”和“受者”均体现出明显的等级性。政府对股价的直接或间接调控常常让“受者”，即股民，措手不及。

老股民张先生向我回忆：“96 年底，12 月 16 号，我印象太深刻啦，《人民日报》发表了六篇社论，说中国股市泡沫，结果股市大跌。那时候我也不懂，只知道股市有涨有跌，套牢了也放着不管，不像现在知道割肉。”

国家的重大事件对股市的影响也让张先生感到难忘。“邓小平去世的时候，股市暴跌 93 点，那时候交易所卖股票还要填单子，5 块钱一张，散户厅大家都在抢单子，挤也挤不上去。”

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并未有太大改变。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依然是股民操作中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即中国股市仍是“政策市”。

股民金先生提到：“中国股市市场外的干涉比较多，比如领导说话。06 年中石油被中国媒体说成最有含金量的股票，管理层证监会都说‘40 元以下大大地买，四十元以上分批地买’，很多股民就这么被忽悠了，不会规避风险啊。”即

使是这种未经官方明确表态的消息，都会于微妙的时刻转化为一种市场力量。但更糟的情况还不止于此。

“512 汶川地震的时候，国家号召我们要维稳要维稳，大多数股民还是很善良的，想想自己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除了捐点钱，大家还说好不许跑，帮国家撑撑盘，谁抛谁就是叛徒。结果呢，都掉下来，懊恼伐。”

当国家力量卷入了风险制造，并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股民如果天真地“举杠铃”，提供其他人撤出的时间，自己就注定要感到失望。因为“市场既没有博爱的义务，也没有孝敬的责任，没有任何原始的，由人的共同体所体现的人际关系”（韦伯，1997：711）。

2001 年，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各种论据来反对这样的说法，然而无论争论结果如何在受访的普通散户中，“赌场论”却因其广泛的认可度被一再地引用。“股市就像赌场……比赌场还不如，我们的底牌都让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而另一个常能听见的股市的比喻则是“泡沫”。这两个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瞬间和短暂性内涵的喻体都充分反映了股民对市场性质的认识，也反映了他们所感受到的市场风险。

2、社会经济大环境下的股票市场

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强了个体投资者的风险和不确定性。08 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国家、机构与普通股民的悬殊实力越发凸显出来，原本已习惯于这种悬殊关系甚至游刃有余的股民也不得不正视他们“弱势”的现实。金先生损失了将近 40% 的市值，一向谨慎保守的老徐未能及时退出，张先生先出再入，套在了 4020 点的高位……“从六千多点跌到一千六百点，有的人市值打掉九折。我们这里这个同济大学教授喏（指陈老师），六十多岁了，讲台上站了一辈子，子课赚点钱，结果要倒在这里了，把头发都做白了。教授前阵子还开玩笑呢，说要是大盘涨停，我穿三点式给你们表演。你看到什么地步了。”基金因其一贯与股市同甘共苦，也无法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同样使他们大受打击。

这是最近的例子，证券市场成立的十几年中，股民们所感受的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危机。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证券市场刚刚兴起的时候，炒股行为还不像今天这样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姓资姓社”的问题是股民们很大的顾虑和压力。

今年 65 岁的老徐早年是化纤厂的车间主任，后来又在组织科工作。78 年文革后调到宣传科做第一任科长，后来又做过劳资科长、人事科长。作为一个老党员和厂里的领导干部，他为人一向保守谨慎，中规中矩。

回忆起最初接触股票的时候，他说：“最初接触股票，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嘛，那时候还不是股票，是认购证，想买也不敢公开，更加不敢在单位里买，怕别人讲。

而且很多人还不相信股票会赚钱，有人到单位来推销认购证，30 块一张，当时工资才多少钱啊，都推销不出去，没几个人来买。我现在知道了，在中国很多事情要第一个做，就能赚钱。”91 年的时候，早有投资意识的老徐拿着自己的一点私房钱，托同学在别的单位买。“他们要凑五个人，后来他在自己单位凑足了，又把钱退给我了。如果当时买成了，就能赚 20 万，一张券一万嘛。”

开始他并不告诉妻子，怕她也担心钱会打水漂，之后便尝试说服妻子一起投资。“一开始她也不相信，九几年我拉她去买认购证，我还记得很清楚，买的‘真空电子’，两个礼拜赚了很多钱，所以说她也开始有这个意识了。”

老徐一方面自己就是单位的领导，在数年之后的股票热中还很不主张职工炒

股、讨论，批评他们影响工作，一方面又不可能无视和浪费机遇，只好采取这样的迂回策略。直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有所表态，才终于让股民免于这种社会压力：“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邓小平，1992：373）。

3、散户的个人背景

从证交所股民们的年龄一望即知，他们都是中国社会由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转变的历史见证者和亲历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社会是由单位制度构成的，单位不仅是人们工作的地方，还包揽了关于他们住房、食物、衣服、健康、养老金等一系列事宜。而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国有企业面临破产或私有化改制。城市单位不再为许多人提供一辈子的“铁饭碗”，超过一百万人不再依附于单位而需要自谋生路（参见 Lieberthal, 2004）。金先生和张先生都是从单位制走出来的股民。

金先生告诉我他入市的缘由：“当时股市是一个新兴事物，我是跟风玩玩，因为还要上班。95年跟单位买断了，成了自由职业者，想想别的行当不好做，就开始把股市当成自己的职业来做。你做别的行业要应对的事情太多，比如开饭店，涉及工商，卫生服务部门，不像炒股，自己是自己的老板。而且所有的股民，不管你是做什么的，进入股市，大家地位上都一样，都是老板，不要看别人的脸色。”

金先生在股市中的投入从开始的2、3万逐渐增加到20万左右，他向我强调说：“当时我投到股市里的钱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的攒下来的真金白银，不是闲钱。但股市刚刚起步，不如现在成熟，制度比较乱，盘面小，股票少，波动大，风险很高，投机性很强。但是收入高。”

其实许多股民都清楚市场存在的风险，然而离开单位后可以从事的职业太过有限，在一些上海人看来，从事某些职业（如保姆、清洁工等）即使收入尚可也不会被考虑，而炒股则是门槛不高又不失“体面”的一种谋生选择。

张先生倒并不是一离开单位就选择当一个“职业股民”的，跟金先生很大的不同在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集体分配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的林场做伐木工人。我们不难理解，即使今后能够回到城市，上山下乡的经历对这一代年轻人的生命轨迹也会产生持续的难以磨灭的影响（参见 Zhou & Hou, 1999）。

张先生坦言自己年轻时在学校是个“捣蛋分子”，没有真正用功读过书，插队后他依然由着性子成天溜回上海，跟一些朋友靠赌博、出千骗钱谋生。几年后大庆油田在林场招工，他便报名成了大庆工厂里洗油井的工人，自此不便常回上海，在那里结婚生根。之后通过妻子的关系，他承包了厂里的项目，自己开公司洗油井，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

“93年发行认购证，听说都赚了很多钱，有一点后悔自己没炒。94年开始投入了五万块，这钱放着也不用，所以试试看。96年的行情比较好，但是那时候还在上班，做点木材生意，帮人家拿合同提取报酬，没有花心思在股市。”

02年的时候，我老婆得了白血病，因为她工作是长期和化学品接触的，所以我当时完全放弃了生意和股票，在大庆、天津四处求医，整天待在医院里。等于03、04完全没有动，套牢在里面，没有时间管。04年底我老婆去世了，我自己的积蓄也花掉了大半，跟我老婆的娘家就发生了一些矛盾，再不往来，从前的生意完全由我老婆的弟弟接手了。所以我就回到上海，开始真正投入钻研股市。”

其实张先生虽然经历更为坎坷，但在入市前所面临的问题跟金先生并无太大差别，孤身回到上海，既无工作又无收入，早年的学习、工作也不可能提供他什么一技之长，即使还有可以提供日用花销的积蓄，但坐吃山空无疑也具有很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形下，炒股又成为了很自然的选择。然而，如果没有太好的运气，这些毫无金融知识和相关经验的下岗、退休、失业人员何以与其它市场精英相抗衡呢？

从市场其它权力主体、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股民们的个人背景来看，普通的中小股民在市场中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风险，因而他们不可能像赫兹所说具有比国家更强的市场控制力，他们在股票市场的权力结构当中处于明显的下层或者说边缘的位置。这群出发自不同的单位和企业的中老年人，最终相聚到了股票市场这同一个超级“单位”，成了城市里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

六、坚持就是胜利——炒股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里尔克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受访的股民们大都对自己在市场上的处境很不看好，他们抱怨甚至谩骂，表现出对市场风险显而易见的焦虑不安，然而他们却都对一件事确定无疑，那就是在今后仍将坚持“以炒股为业”而不愿放弃退出。这种生活状态的稳定性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上文我刚进营业厅时所见的股民在熊市时仅仅是过来织毛衣、摆牌桌的景象，正是这种对比最好的写照。

通过日复一日往返于证券所和家庭之间，炒股这项活动已经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投资行为。家住营口路营业厅附近小区的潘阿姨开玩笑似地说：“我已经是‘八年抗战’了。每天两点一线，‘开盘不迟到，收盘不早退’，不来看看心不定，因为感觉一家一当全都在这里，每天都要来看看我这些‘儿子女儿’（指股票），以后就准备靠它们养老呢。我为了看盘，同学同事聚会叫我都去，逛街 shopping 也都放弃了。我们戏称到年终赚不到钱没关系，交易所还会发个‘全年满勤奖’给我。”

如果有谁今天不来，那家里肯定有大事了。有谁走得早，都会调侃他，这么早就走了，等歇大盘要全涨停了哦。有人有事情白天不来，收盘前一刻钟会赶过来看看，不看心不定，好像说一天没有来过，少了点什么。大家就拿他开玩笑，大半夜还来干什么啦。到这里来是有瘾的。”

“满勤奖”只是句玩笑话，像潘阿姨这样的中户至多可以得到证交所有限的补贴：包括大约 150 元/月的饭贴和相对较低的佣金，但是它却反映出，这些中小股民对于股市的坚守，表面看来是对于盈利和亏损的关心，实则更多是出于一种常年养成的习惯，心理上的满足却比物质上的收益显得更为重要。在这里，股票还被比作了“儿女”，我了解到，潘阿姨的女儿刚结婚不久，还没有孩子，对于潘阿姨来说，这样的比喻其实包含了，在儿女成家，生活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后，她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寄托，这就是股票。

更多小散户都得不到营业厅任何鼓励性质的好处，但也每天自带盒饭，同样“忠诚”地守在拥挤的大厅里。

王阿姨是北京人，十几年前从长海医院退休，由于身为军人，没有户口，她特地借用儿媳的身份证在营口路开了户。“现在股市不好，但是天天都来，我中午就带点饭菜在这边吃，不过来不放心，所以我都快十几年没回北京了，也很想回去看看呀。”我便问她既然这样，现在市场又不好，何不退出股市回家看看，她的回答很让人哭笑不得：“本来前几年大涨时候，套牢的终于扯平了，是想退出不做的，但是因为用媳妇的名字开的户，需要她过来取钱不太方便，这么一耽搁就又套牢了。”这个“不能”的理由不免过于牵强，以至让我觉得更多的原因其实还是“不愿”。

果然，当我们继续聊下去后，她说：“我不是想来赚钱的，像我退休工资 2600，我爱人是 3000，生活基本没什么问题，就是纯粹过来玩，不爱去公园，炒股票有时涨有时跌的比较刺激。抱着玩玩的心态，赢了开心，输了也开心，就当过来跟这里的朋友拉家常。我已经输掉十几万加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了，但是自己觉得钱还是够过来小玩。输不起就不应该来这里，弄到晚上睡不着觉，心脏病高血压发就没有意思了。”

王阿姨寻求的“刺激”也是很多股民们对自己炒股生活的评价。有趣的是，中老年散户与时下以公务员等象征稳定的职业为最佳选择的年轻人之间表现出了如此反差和错位的风险观：本应追求冒险和闯荡的青春崇尚保守和“一地鸡毛”式的生活，而青春不再本应开始享受安稳的一代却在高风险的股市中“玩得就是心跳”。

如果说潘阿姨的购物之欲与王阿姨的思乡之情都可以坚忍卓绝地摒弃到底，那么身体上的病痛不免成为了对这些中老年人最大的考验。但是出人意料，我们不必寄望他们逐渐衰老的身体能在这场对抗中有太大胜算：

老徐 99 年退休后就养成了天天和妻子到证交所的习惯，前些年他得了严重的胃病——严重到“连楼梯都走不动”，连每周去儿子家看看孙子的固定安排都变得不固定了。但即便如此，证交所却仍旧是要去的，每天照样在二楼的中户室里一坐数个小时，他的儿媳说起这事一直颇有微词。

不仅如此，老徐也为了炒股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里弄里面叫我去做业委会委员，350 个人里选了 7 个人，还让我负责支部工作，写迎世博的文章，我不愿意去。如果我在家里肯定要被他们叫去的，那时候就更加忙了，没有时间炒股。所以我不跟邻居什么的说自己炒股，就说在外面‘打工’，人家问哪里，我就说鞍山。有时候打招呼说‘上班去啊’，我就说是啊。”老徐还说：“我想把炒股作为一种事业，而不仅仅是消遣。”

他多次以“上班”乃至“事业”来形容炒股，以其退休前在单位中表现一向积极、先进的“领导”身份来看，显然炒股这项活动的意义已经不仅在于能够让他获得实在的利益，同时也能他重温过去在工作中才能产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的表现在于，他非常得意于自己在股票研究上的努力与心得，并且不止一次地向我和其他人展示：

老徐告诉我，他们夫妇在投身股市十多年后养成了这样雷打不动的习惯：“我们早上七点听广播，九点开市过来，午饭就在这里吃，下午三点收市，回去听听‘第一财经’，六点看‘第一财经’的电视，晚上九点半湖北卫视左安龙。要关心时事，包括国外的，还有期货、金属交易等等。”

几乎每个股民都能脱口而出一张各方面时事新闻的时间表，和老徐同在控江路营业部炒股的金先生也是“眼观八方，耳听六路”：“我回家之后看新闻，晚上八九点看欧洲的股市，十点半到十一点看美国股市，早上八九点日本股市，还要

看各种网上信息，有什么政策。这些功课都一定要做的。”

确实，虽然像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这些中老年股民在生活中常会抱怨自己年龄大了，记忆力衰退，但对某些数字和日期，他们却会显示令人惊讶的记忆力，例如他们可以轻易地忆起数年前某一天导致大盘涨停的大新闻，或是自己支持有的某支股票当天的价格，一如财经频道中侃侃而谈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范围涉及有色金属、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纺织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各类行业；他们中最老的老太太也可以说出连很多大学生都说不清的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因为他们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这是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时代。

通过长时间的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对党的政策灵敏度高”，能够真正“听得懂”新闻，对各种信息“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因为不同于很多人，对于证交所的股民们来说，时事新闻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国家出台的一条政策、上市公司的一篇通告、国际油价、汇率的一次波动都会因为对股价具有指南针的作用而触动他们的神经，引发他们的讨论。在鲍曼对现代国家个体化社会的论述中，个体化社会意味着公共领域被私人生活殖民，公共领域中充满的是八卦、流言蜚语这些私人生活（参见鲍曼，2002），但是营业厅却成了一个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紧密相关的公共空间，这也是股民的日常生活所创造的意义之一。

自学股市知识是股民们用以抵御风险的另一种重要策略，老徐在这方面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在最初接触股票的时候，几个朋友成了他的“导师”：“我一开始去证交所，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这个人不肯认输的，开始买书自学和向人请教。一个是我原来厂里的财务科的同事，他比较专业，做短线，自己写了很多东西，我那时候一直跟他通电话请教，而且走访他家很多次。还有一个是交大毕业生，是我高中一个女同学的丈夫，我去他们家看到房间里，四面墙贴满了报纸、心得。我当时就也想要下功夫做好这件事。”为了能学习到别人的“核心技术”，老徐不仅态度谦逊低调，还常常送些茶叶、香烟给朋友作为答谢。如今他已经可以颇为自傲地说：“我认为股市是泡沫市场，也是‘博’场，要下功夫、学知识。那个时候一个星期去两次书城，现在买了有将近 30 本股票的书，还有不少都已经送人了。”

在他的表述里，这个股市知识增长的漫长过程就如同在职场上从“新人”晋升为“前辈”的过程一样充满了困难，同时也充满了成功后的满足。

周末时，亲戚来访，只要对方也在炒股，他们便开起了“股市小沙龙”，老徐会把对股票毫无兴趣和经验的大儿子撂在一边，热情地把自己研究所得在电脑上操演给亲戚和小儿子看，声明：“外面人我是不告诉的”。这些心得的作用当然是为了在股市里赚取更多的钱，然而事实上它是否能够在实践中让老徐和他的亲友获得财富已经并不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投注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下功夫”的过程，他自认学到并创造了“知识”，并且享受着与人分享的快乐。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股民所学习和生产的各种知识都很难使他们在熊市中幸免。但一次次无可避免的失败促使他们总结出了一条条经验教训——要设置止损点防止侥幸心理、要独立思考避免被媒体忽悠、要分散风险或是集中火力、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在别人贪婪的时候害怕，在别人害怕的时候贪婪……当然，还有更多的操作经验因为对我来说显得过于“专业”而没有被一一记录。老徐、金先生等老股民都表示，要给自己的子女也灌输必要的炒股、理财相关的理念，尤其是他们在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中遭遇的失败经验。

“中国第一股民”杨百万曾说，股市如人生，一个涨跌，人性的弱点和优点都在里面了。如此看来，股民们在炒股中总结出的心得也不仅有关金钱，而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他们对自己人生的领悟。

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概念之一，“人情”、“关系”（参见 King, 1991）也在股民之间的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老徐：“我毕业后参加高考，没有考进一本，他们让我去政法干部学校，我们一届的同学后来有的留在学校，有的在高院、公证处、法援主任、律师，都蛮好的。

周末杨浦公园对面会有个沙龙，但是我从来不去的。那里的消息没有可靠的。消息要直接传来的那种才有用。我一个同学是中西医药的科长，我有次打电话问他，中西医药的股票能操作吗，他上班的时候还不敢说，晚上打电话来，说暂时还不能‘拉’，有什么什么事情，结果过几天真的跌了。”

“消息”指的是股民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大机构投资动向及上市公司的重组、注资和国家相关行业政策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股民的操作。由于“消息”更多地不是以公开的新闻、通告等形式传播，而经常是先于这些文本通过各种人际关系获得，“消息”实际上成为了股民们拥有多少社会资本的一个指标：在很多人看来，炒股炒得好，就说明掌握可靠的“消息”，即进一步说明具有广泛的人脉和关系。老徐的这段表述就清楚表明了，他是一个有“消息”的人，这帮助他在股市中获得安全。

若没有可靠的消息，又不善于自己分析，有的股民就会完全按照别人的投资策略而行。正因如此，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张先生在营口路的中户室里倒是颇受欢迎，由于他的好眼光，很多没有主意的股民都跟着受益。

张先生说，“有的人炒股不肯跟别人说，我在交易所别人问我的炒什么，为什么选这个，我都肯说给他们听，我什么时候抛也告诉他们，别人抛不抛我不管。

以前那个房间还有很多人跟着我炒，大多数都能赚钱。像小潘，以前有个000680山推股份，3天跌了2块，我抛掉后到12块再买进赚了，我就让她抛，那次她不肯，结果就没有赚钱。”

潘阿姨就是跟着张先生炒股的股民之一。在这里，张先生表示不要求受惠者返还给他任何获益，也无意与对方建立任何从属关系，只是一种纯粹的“帮助”。这一方面表明了他的慷慨无私，另一方面也表明，有人跟着操作，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这代表了其他股民对自己炒股能力的一种肯定，说明他炒股盈利绝非全靠运气。

同时，股民之间关系的建立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炒股生活的稳定性。潘阿姨在她的“八年抗战”中曾完全退出过一次股市。然而，“只停了两个月，就回去了。因为还是要跟交易所里的朋友交往的嘛，过来玩，当时股市又在拉升，忍不住又买了……除非你跟这些朋友全部断交，把所有的卡都剪掉，否则是不可能退出来的。哎，总书记说‘不折腾’，我这是折腾来，折腾去。以后嘛也想赚点就退，但是还不敢这么说，当年要退还不是没退出来，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七、总结

在对炒股生活的意义分析中，我没有过于强调股民对财富的追求，这当然并不是说炒股无关财富，恰恰相反，对财富的期望总是最原初和极其重要的动因。事实上，在我所接触的股民中，就有人用炒股赚来的钱彻底改变了生活，炒股前是一个与单位买断的普通职工，炒股后不仅能养家糊口，负担孩子读书，而且过上了有车有房的富裕生活。也有人虽无生活压力，却也受到股市中各种暴富传说

的诱惑，投身于股市。

但是，就像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分析巴厘岛斗鸡这一深层游戏时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游戏中，钱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或期望的效用尺度，不如说是一种被理解的或被赋予的道德意义的象征。……更为重要的还不是物质性的获取，而是名望、荣誉、尊严、敬重。……金钱是重要的事物，而且一个人在金钱方面所冒的风险越大，关联到的其他事物就越多，诸如他的自尊、自信、冷静和男子气概”（克利福德·格尔茨，2008：446-447）。在这里，我所想要探究的其实也是炒股所直接追求的金钱、财富背后所附着的更多的意义。

对股市和股民的人类学研究无疑可以算作经济人类学的主题。在理查德·维尔克（Richard R. Wilk）看来，从20世纪60年代形式主义者与实质论者的论战到70、80年代最富争议的农民研究，经济人类学家所思考的每个主题最终都回到关于人类本性的基本问题上，例如“自由意志相对决定论”，例如“人是能动者还是受害者”（参见庄孔韶：2008）。我们在这里所要展示的股民作为市场上的弱者所创造出的生活意义同样关乎这些问题。

我们在全文的前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全球股市的诡谲难测，还是股民们过往的经历、匮乏的知识带来困境，都是在短时间内无法克服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股市中不可能获得赫兹所说的那种胜利，即拥有比国家更强的市场影响力。然而我们看到，08年金融风暴诚然削减了股民的股票市值，突出了他们相对其它投资主体的弱势地位，却对股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有限。相反，它考验并提高了股民的耐受力。我们借此时机看到了股民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患难”关系。面对亏损，股民仍然不愿，或者说，无法退出股市。他们仍然激昂地学习，热烈地讨论，紧张地探听消息——这无疑是一个追求财富的过程，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失望和喜悦、空虚与满足、教训与经验，都已经变得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弱者的胜利。这种胜利是指，股民超越了“国家-个人”的市场权力框架，把他们演出的“剧场”从股票市场拓宽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他们坚持把炒股作为生活方式，并赋予这种生活以重要的意义，本文认为，这是股民用个体的日常行动应对市场结构性力量的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1998,北京:三联书店。
-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
- 3、龚浩成,《上海证券市场十年》,2001,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4、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译,200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5、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2008,南京:译林出版社。
- 6、潘伟荣,《职业股民——股市精英透视》,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7、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
- 8、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2002,上海:三联书店。
- 9、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2003,南京:译林出版社。
- 10、庄孔韶,《人类学经典导读》,200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1、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2007,南京:译林出版社。

英文文献:

- [1] Abolafia, Mitchel Y. 1996. *Making Markets: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 Gates, Hill. 1996. *China's Motor :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3] Hertz, Ellen. 1998. *The Trading Crowd: 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 King, Ambrose Y.C. 1999. Kuan-his and Network Building: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Edt by Tu Weim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Lieberthal, Kenneth. 2004. *Governing China*. W.W. Norton & Company.
- [6] Scott, James C.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见中译本:《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
- [7] Zhou, Xueguang and Liren Hou. 1999. "Childre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he PRC". *Am. Social. Rev.* 64.